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9.02.001

秦立志:“陆海复合型国家战略转型的动力机制——兼论对中国的启示”,《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2期,第1-12页。

QIN Lizhi,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Maritime-Land Countries’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and Its Enlightenment for China”, *Pacific Journal*, Vol. 27, No. 2, 2019, pp.1-12.

陆海复合型国家战略转型的动力机制

——兼论对中国的启示

秦立志¹

(1.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 大连 116044)

摘要: 本文将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与地缘政治相结合,分析陆海复合型国家从陆权到海权转型的动力机制。动力机制主要由体系结构和单元、次单元要素构成。体系结构涉及地缘格局、地理互动和攻防平衡三部分,它们共同形成国家所面临的包容性/约束性战略环境;单元和次单元层面涵盖战略学说、崛起路径、国内汲取资源和动员能力、国内经济转型四要素,它们分别影响国家战略决策的认知、决策制定和执行。外部战略环境作为自变量,需要通过国家战略决策层面这一中介变量的过滤,才能对战略转型发挥作用,且自变量与中介变量的作用大小通常成反比。中国从陆权到海权转型的历史背景、战略环境、崛起路径、战略学说、资源汲取和动员能力等方面具有时代的特殊性。中国最佳的转型路径应是陆主海从、防御性模式,兼顾“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避免陷入大国崛起和战略转型的过度扩张悲剧。

关键词: 陆海复合型国家;新古典现实主义;战略转型;海权;陆权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9)02-0001-12

中国正由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的转型,着力推动海洋维权向统筹兼顾型转变。^①首先,基于历史视角,尽管中国在战略传统上偏重陆权战略的谋划和陆上力量的建设,但中国也有悠久的历史海权发展史。其次,从中国周边地缘环境的动态变化看,中国既有海陆兼备的双重地缘属性,又对大陆和海洋都有重大的现实诉求。第三,就国际体系的战略格局演变而言,冷战以

来,世界政治中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是欧亚大陆的地理政治重心正在从西欧向东亚发生明显转移。^②第四,现实主义权力政治信条依然大行其道。从崛起大国与霸权守成国的结构性冲突看,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正在威胁它的霸权秩序,自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以来,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经贸领域也频现危机,中美矛盾升级的可能性加大。正如

收稿日期:2018-08-02;修订日期:2018-11-0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海权专项重大课题“四种海权发展模式互动中的周边国家和域外国家的海洋政策及其中国对策研究”(17VHQ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秦立志(1989—),男,黑龙江绥化人,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大连外国语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地缘政治学、中美关系。

*感谢《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① 胡志勇:“积极构建中国的国家海洋治理体系”,《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4期,第15-24页。

② 吴征宇:“地理政治变迁与21世纪前期的美国大战略”,《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2期,第61页。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实质而言,当今的国际政治在本质上与修昔底德所描述的古希腊世界没什么区别。”^①中国的战略转型应力求以应对最坏情况的可能发生为基础,而中国周边海陆邻近大国众多,“彼此相邻的大国间的地缘政治结构决定了其天然对手的命运,这是大国政治的普遍规律。”^②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和机遇,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且机遇大于挑战。^③“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意图实现海陆平衡发展的体现,既不是恢复明朝的册封体制,也不是中国式的全球化,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④

一、“陆海复合型国家”的独特性分析

所谓“陆海复合型国家”,是指背靠较少自然障碍,且面临开阔性海洋的国家。^⑤具有如下独特性:

第一,在地理和战略层面上,它具有区别于其他地缘类属身份国家(岛国、内陆国等)的特殊性。地理上的陆海兼备,使它不能像岛国那样在安全领域优先巩固海权建设、在经贸领域专注海洋经济;也不像内陆国家全力经营陆权国防和陆缘经济;它面临海权与陆权战略的两难选择、海陆资源分配分散化问题、海缘与陆缘威胁的双重易受伤害性等。只有实现陆权与海权战略的统筹协调,才能避免陷入过度扩张或发展不足。

第二,领土面积大小与领土形状影响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发展上限。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认为,领土面积的极大差异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具有指导国家战略行为上的含义,大国的行为很可能不同于小国行为的某些特征。^⑥从国际关系史的演绎逻辑看,从最初地中海的威尼斯霸权、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本初子午线分割势力范围、到荷兰的海上马车夫地位、英法百年争霸和德国崛起、再到具有洲际领土规模资源的美苏争霸,及至21世纪雄踞东亚大陆的中国崛起,制度和技术的差异可以随着全球化进程而降低代差,但地理幅员的多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崛起和发展的天赋上

限。尽管在现代技术条件下,距离的迟滞作用已大不如从前,但地域辽阔的国家在核打击承受能力方面仍较国土狭小的国家有更大的优势,这赋予国土幅员广阔的国家在核威慑与核讹诈面前更多底气。总之,国土幅员的大小与国家战争潜力有密切联系。

国土形状也是构成国力的重要地理要素,量化国土形状特征的重要指标是紧凑度和规则度,即对于给定研究的国家领土,如果面积是一定值,其边界越短,形状则越紧凑,最紧凑和最规则的二维国土形状是圆形。菲力二世(Philip of Spain)时期的西班牙,作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有很强的政治权力和动员能力,但地理上的脆弱性较高,“一个由多块不同领土构成的分散的全球性帝国,在与地理上更紧凑的国家的冲突中必定处于不利境地,后者的资源较易得到动员,而且那里的权力集中。”^⑦

第三,不同的海陆度值,影响了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基本国防及经济战略定位。从地理上讲,军种比例主要是由国家的海陆度决定的,海陆度是一个分析概念,是用来描述一个国家是海洋国家还是大陆国家的程度分析数值。最简单的海陆度测算方法是将一个国家的海岸线(或海上疆界线)长度比上大陆疆界线长度。数值越大(即海陆度值越大),则这个国家的海洋性越强,越偏向海洋国家;反之数值越小,则越接近大陆国家。但在实际情况中则不会这么简化。如果国家的战略和经济重心不在沿海而是内陆,能够自给自足,那么也很难算是海洋性国家。

①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227-228.

② Martin Wight, *Power Politics*, Roya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78, p.158.

③ 贾宇:“关于海洋强国战略的思考”,《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期,第1-8页。

④ 杨国栋、王小东:“‘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误区与理论探索”,《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期,第75-81页。

⑤ 邵永灵、时殷弘:“近代欧洲陆海复合型国家命运与当代中国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0期,第50页。

⑥ 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Pinter, 1998, p.73.

⑦ Giovanni Botero, *The Reason of State*, translated by P.J. and D.p. Waley, London, 1956, pp.9-12.

尽管苏联这样的国家海岸线很长,但无论从历史还是地理层面看,都更偏向大陆性国家。因为苏联的海岸线主要在北冰洋沿岸,长年封冻不便通航,其它出海口又被它国控制,陆上威胁众多,海上对外联系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不占主导地位。这决定了其常备军的五大军种为:战略火箭军、陆军、防空军、空军和海军,陆权至上的战略传统与现实环境,使其把海军置于军种的末位。美国的海岸线长度优于大陆疆界线,陆上威胁羸弱,具有外向型经济发展传统,为其缔造海洋国家奠定了基础,故常备军军种为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由于中国推进的战略转型是海洋维权向统筹兼顾型转变,^①考虑到陆上邻国众多和漫长的陆疆线,故仍然会维持陆主海从的战略导向,常备军由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组成,在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强化陆上贸易纽带。

二、转型机制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框架

在阐述新古典现实主义对战略转型动力机制的分析框架前,应该对“战略转型”、“动力机制”等进行概念界定和解释说明,回溯关于战略转型的文献成果。

“战略转型”是指崛起中的大国,将安全、军事和经济等领域的发展重心从陆权向海权转移,在战略重心上呈现出陆主海从、陆海并重和海主陆从等三种表现形式。它属于国家大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战略手段以国防力量为主导,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手段等。转型的目标包括海权格局和海洋秩序的改良或变迁、海上交通线的护航、海洋领土的防卫、海洋经济、海洋科考、海洋文化的推进等。如何平衡战略手段与目标、海权与陆权格局,正是国家在战略转型中最为关注的问题。

历史上崛起的陆海复合型国家,会推动从陆权到海权的转型,学界对这些国家的战略转型进行了考察。格雷戈里·吉尔伯特(Gregory Gilbert)分析了公元前550—公元前490年波斯为了征

服或遏制希腊,转型为一流海洋强国。^②拜里·斯特劳斯(Bailey Strauss)研究了斯巴达从公元前431年至前404年从大陆向海权转型的时代,驱动斯巴达进行战略转型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取代雅典成为希腊海上霸主。^③阿瑟·M.埃克斯坦(Arthur M. Eckstein)分析了古罗马从陆地强国变成海上强国的发展历程,认为与迦太基的地中海争霸是转型的核心动力。^④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列出了美国走向海权的驱动因素:扩展海外利益、保护海上交通线、应对其他大国海外军事基地的威胁。^⑤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认为陆上大方向边缘地带扩张时,会为了建立世界帝国而发展强大的海权。^⑥例如,德国领导人对自己成长为海权强国的希望所可能产生的后果的恐惧,孕育了“哥本哈根情结”,进一步加剧了德国与英国海军军备竞赛的紧迫性。^⑦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认为只顾自身利益的帝国主义集团“劫持了国家”,把国家安全利益扭曲为对其狭隘利益的追求,从而导致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和苏联时期在海上和陆上的过度扩张。^⑧有学者认为,勃列日涅夫苏联的发展海权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与美国争霸。^⑨苏联想成为海上超级大国,从而取得经济、军事和政治利益。^⑩K. M.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提出印度

① 胡志勇:“积极构建中国的国家海洋治理体系”,《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4期,第15-24页。

② [美]安德鲁·S.埃里克森、莱尔·J.戈尔茨坦、卡恩斯·洛德主编,董绍峰、姜代超译:《中国走向海洋》,海洋出版社,2015年版,第24-48页。

③ 同②,第51-76页。

④ 同②,第78-103页。

⑤ 朱听昌著:《西方地缘战略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⑥ [英]哈尔福德·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1-62页。

⑦ Steinberg J., “The Copenhagen Complex”,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3, No.1, 1966, pp.23-46.

⑧ [美]杰克·斯奈德著,于铁军译:《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4、70-116、227-268页。

⑨ [美]西伯奇编,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译:《苏联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海上力量》,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⑩ [英]戴维·费尔霍尔著,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译:《俄国觊觎海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战略转型的短期目标是建设一支区域性海军,确保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自由航运安全,长期目标是称霸印度洋、主宰地区相关海洋事务。

既有文献对战略转型的动机和目标综述可以概括为四方面:巩固和扩大崛起成果;实行权力扩张;提升国家威望;国内政治经济需要。由此可见,历史上的陆海复合性强国,几乎都通过战略转型来改变权势现状、推行进攻性的战略和扩张行动。对此,国外学界和战略界也将中国与历史案例进行类比。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认为,中国与历史上其它大陆国家一样,在拥有强大陆上力量的同时再具备足够的海权实力,那么无论意图如何,都被其视为具有修正主义倾向。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指出,中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一样,是崛起中的大陆国家,美国则类似当年英国那样是一个海军强国。如果中美两国陷入战略对抗和冲突,类似一战前的欧洲地缘格局将会在亚洲重现,形成两大阵营的对抗。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有可能建立一支非对称的、马汉式的海军,符合马汉式的三段论,即商业—基地—舰队。

诸多国外学者将中国与历史上其它崛起大国的战略转型进行盲目对比,进而强化“中国威胁论”的观念,很重要的原因是忽略了中国的转型与历史上的诸多案例有着截然不同的动力机制。所谓动力机制,意指对国家战略转型的生成和演化产生推动或规制作用的变量,涉及体系结构、单元和次单元等多层面要素。地理和权力要素,都不能单独决定陆海复合型国家在崛起之后,必然走向地缘扩张。地理决定论和权力决定论不符合中国“和平崛起”、“建设海洋强国”的防御性诉求。为了在学理上驳斥“修昔底德陷阱”、国强必霸论等关于中国崛起和战略转型的误读,我们有必要厘清中国与历史上其它大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动力机制来驱动战略转型,佐证中国战略转型的特殊性与和平崛起的可能性。

新古典现实主义解释了国家在面对外部战略环境挑战和机遇时的应对方式。它赞成结构现实主义的核心假设前提——体系结构居于分析国家战略决策的主导性地位。^①但国际环境

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提供明确清晰的体系信息,国家有更多的战略选择菜单。新古典现实主义从四个方面揭示了结构现实主义模型的缺陷:领导人并不总能感知到体系结构所折射的清晰信息、国家所处的外部战略环境通常缺乏明确性、领导人即使在正确认知结构要素的情况下也未必遵循理性决策、国家并不总能根据体系压力动员恰当的国内战略资源。^②

新古典现实主义主要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着重考察结构现实主义所不能解释的与体系指令相背离的次优战略选择,即在体系结构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的情况下,用国内政治变量来作为解释国家对外战略的自变量,其实质是分别用结构变量和单元(次单元)变量来解释不同类型的问题。这类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从单元或次单元层面去解释偏离结构现实主义预期的国际现象,是作为结构现实主义的补充。如兰德·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对“制衡不足”的四个国内政治变量解释(精英共识和精英凝聚力、政府/政权脆弱性和社会凝聚力),即国家内部处于松散或分裂状态时,难以对制衡行为投入足够的战略资源;斯奈德强调国内多样化的政治和利益联盟对国家外部战略目标和资源分配的分散性影响;杰弗里·托利弗(Jeffrey W. Taliaferro)结合了领导人对外来信息的理解和处理,来解释大国在只具有边缘利益地区的介入和干涉的动因;^③克里斯托弗·莱恩指出在不符体系结构预期的条件下,自由主义国内政治联盟推动了美国采取域外霸权战略。第二类是构建全面的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研究路径,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C. Wohlforth)等学者认为,国家战略是体系结构压力的经验评估

① Rathbun B.,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Neoclassical Realism as The Logical and Necessary Extension of Structural Realism", *Security Studies*, Vol.17, No.2, 2008, pp.294-321.

② Kitchen, Nicholas, "Systemic Pressures and Domestic Idea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Model of Grand Strategy Form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6, No.1, 2010, pp.117-143.

③ Taliaferro J. W., "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s: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Extractive State", *Security Studies*, Vol.15, No.3, 2006, pp.464-495.

和国家决策者战略思想博弈竞争共同生成的产物。他们将相对实力分布与极的数量、包容性/约束性战略环境视为体系结构变量,而把地理因素、军事技术上的攻防平衡等因素视为对结构要素的修正,也被称为结构性条件因素,并认为结构性调节因素未必会影响到体系内的所有国家。将领导人的意向、战略文化、国家—社会关系、国内制度等单元和次单元层面要素对国家战略决策的影响作为中介变量。将不同类型的政策反应和由此产生的国际后果作为因变量。认为自变量起主导作用,但要通过中介变量的过滤才会输出因变量。

总之,第一类新古典现实主义主要是解释结构现实主义所不能解释的案例,而第二类新古典现实主义则是要更广泛的解释国家的大战略转型与调整。由于实力强大的国家通常在体系压力面前的政策自主性会相对自由,因此,对于崛起中的陆海复合型国家而言,体系结构所塑造的战略环境确实会对其战略调整产生重大影响,但这种结构性因素不会对转型机制的生成产生直接效应,而是必须通过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等中介变量的过滤,才会促进国家推行从陆权到海权的战略转型。战略转型的长时段存续,这本身就超出了结构现实主义的体系压力决定论的解释范围,很难单纯用紧迫性的国际危机或战争风险来解释其转型动因。对战略转型动力机制的考察,需要综合运用结构、单元和次单元等多层次的视角全面解读。故用第二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框架来分析动力机制更具说服力。

三、战略转型的体系与单元层面动因

本文将参照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框架,对战略转型的体系、单元及次单元层面的动力因素进行考察。但并非照搬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变量设置,而是结合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综合分析。并对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战略转型所发挥的作用做简要说明。

3.1 体系层面

相似的战略转型在历史上的诸大国中循环

重现,无论这些国家有何差异,也不论它们在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是否相似,强国的战略选择不同于弱国,也不同于既非强大也非弱小的国家。遵循新古典现实主义的逻辑起点,将国际体系中的相对权力的地理分布与极的数量(地缘格局)作为影响国家战略转型的首要 and 主导性因素,是体系结构因素。从陆权到海权的战略转型意味着在地理和技术上增加与其它大国的互动。这就需要考察结构性调节因素(或战略互动因素),即大国在地区或全球地理空间的政治经济互动,以及军事技术领域的攻防平衡对大国战略关系的潜在影响。技术和地理等结构性调节因素会制约体系结构的影响效果。

体系结构和结构性调节因素限定了战略转型的方向、程度和影响效果范围。对于体系层面的这些要素如何作用于国家的战略转型,可以从包容性/约束性战略环境这个指标入手。这里有个理论上的前提假设,即国家能够大致识别体系为国家提供的威胁和机遇信息,能够有限理性地甄别最优决策选项。如果不能识别,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当所处战略环境面临威胁和机遇的紧迫程度越高,国家越处于约束性战略环境,反之则是包容性战略环境。接下来将用战略环境的包容性/约束性这一指标,对地缘格局、地理互动与军事技术的攻防平衡等体系动力因素进行分析。

(1) 地缘格局

地缘格局是大国权力博弈的结果,塑造地缘格局的主要是大国,当格局形成后,会保持相对稳定性。大国在转型进程中与其它国家的战略互动,可以按照力量极的多寡、横向地域分布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建构立体的地缘格局动态描述。

根据大国数量的多寡,可以将地缘格局分为单极格局、两极格局、三极格局、多极格局等。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多极均势格局最为稳定,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则推崇两极格局的稳定性,而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则强调单极能带来体系的和平与稳定,学者普遍认为三极格局是最不稳定的。但极的数量本身并不能决定大国在战略转型中所面临的是包容性还是约束性战

略环境。按照权力的横向地域分布来讲,可以分为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地缘格局。有时陆海复合型国家的战略转型,未必是受到全球性地缘格局的影响,而是地区性或次地区格局变迁所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走向海洋大国,就是与美洲地区的美国单极格局形成有关;印度对海权的追求,则是受到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的地区单极化格局影响。地区格局的变化在某些时刻会超过全球地缘格局的作用程度。

比起极的数量本身而言,不同类型格局之间的转化往往对国家的战略转型会产生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的影响。拿破仑三世法国与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是在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后,法国取代俄国成为欧洲大陆霸主的情形下出现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从陆权到海权的战略转型,是发生在欧洲由英法俄普奥五强均势格局向英德两极化趋势的演变时期;苏联推进国家海上威慑力建设,则是在美苏从不平衡到相对平衡的两极格局演进中形成的;中国的战略转型,也是与冷战后美国单极格局向中美两极化趋势演变一脉相承的。

至于地缘格局为国家提供的是约束性还是包容性战略环境,则要看其为国家提供的威胁和机遇的地缘方向。由于面临潜在的海陆双重战略挤压的风险和双重扩张机遇,作为持续崛起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在地缘格局上通常属于体系中心型强国,在战略转型中可能面临三种地缘威胁:海权型威胁、陆权型威胁、陆海双缘威胁。^① 国家试图通过转型来防止外部威胁的发生,控制外部威胁的升级和蔓延,化解外部威胁。^② 同理,也可能面临三种扩张或发展的机遇诱惑:海上机遇、陆上机遇、陆海双重机遇。当国家面临陆海双缘威胁或双重扩张机遇诱惑时,则战略环境越具有约束性,如果国家只是面临海上或大陆的单一威胁或机遇诱惑时,则战略环境相对具有包容性。

外部战略环境可以分为海陆两个地缘方向,如果国家面临的外部威胁或机遇主要集中在陆地,来自陆上的战略威胁和经贸发展等利益诱惑更为突出,那么可能缺少大规模发展海权的动机或推进规模有限的陆主海从式转型。

如果所面临的外部威胁或机遇诱惑主要来自海洋方向,如大国海军军备竞赛的加剧、对海外经济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程度增加,而陆上防卫压力较低或陆上经贸等利益诉求较低,则可能推行规模较大的战略转型,甚至完全从一个陆权主导国转型为海权主导国。如果在海上和陆上都面临较高的外部威胁或机遇诱惑,那么可能推行陆海并重的战略转型。

(2) 地理互动

地理因素作为推动战略转型的结构性的调节因素,只有通过大国之间的地缘互动才能实现。国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活动都要依托一定的地理空间展开,海权的扩展与海上安全和经济利益有重要关联,离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迁和全球化的影响,难以对国家的战略转型动机做出全面解释。地理互动主要包括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层面的互动,提供了国家从陆权向海权转型的安全和经济动机。从地理互动的媒介来看,海陆相对位置、地理距离和通达度起核心作用。如陆上安全环境的形势、海上和陆上工业技术的发展、海岸线和出海口的地理特征、国家所掌握的海军基地、战略通道、关键海区等,这些军事地理、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要素,塑造着决策者的精神地图,对国家的战略互动发挥了重要影响。

从海陆相对位置来看,陆海复合型国家地处陆海结合部,是海权与陆权交互作用的活跃地带,面临海上与陆上经济利益的双重诱惑。海洋经济比大陆经济更具外向型和开放性,国家从陆权到海权的转型,通常会受到海洋地理互动的利诱,这种利益涉及海底石油、渔业资源、海外贸易和航道安全等。地理大发现后,随着全球经济重心的不断转移,国家的战略取向也在发生变化。19世纪末美国的战略转型,是在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盛行、帝国主义掀起瓜分海外殖民地的狂潮,以及经济全球化全面展开的背景下发起的,美国受到海外消费市场、投资场所、原料产地的经济

① 无论真实的威胁是否存在,只要决策者将该威胁纳入战略考量,就会起作用。

② 周丕启著:《大战略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利益诱惑,其随之提出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以及1898年美西战争后对古巴、菲律宾、波多黎各等重要海上要地的占领,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都有强烈的海外经济获益动机,也为马汉的海权学说传播提供了经济理由支撑。

就地缘距离的邻近程度而言,只有在陆上邻国相对友好或缺少强敌环伺时,才能具备向海洋转型的足够动机。地缘距离的邻近性决定了邻国彼此战略投射的倍增效应,形成邻国效应。如果一个对本国友好的国家,会因为与本国的地缘毗邻使战略效益倍增;而一个对本国敌对的国家,会因为它是邻国而使战略损耗倍增。友好的邻国哪怕是海上邻国都可以成为本国的战略缓冲地带,降低守卫本土的国防成本;而敌对邻国的存在,尤其是与敌对邻国有漫长边境线的情况下,则使本国要倾注巨量的海上或陆上资源进行防御。中苏结盟与分裂、中俄关系起伏,对两国从陆权向海权转型的战略成本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在基本解决了加拿大和墨西哥潜在的陆上威胁后,得以加速向海权转型。这都足以证明邻国效应对大国发展海权战略的重要作用。

地理通达度会影响上文提到的海陆相对位置和邻国效应。邻国作用与距离磨损不是单纯的反比例关系,因为要受到地理通达度这一干预变量的影响。通达性是从某一地域到达或攻击另一地域的难易程度,涉及地理障碍物、交通运输系统的发达程度、战略补给点的多寡等方面。当两国缺少天然地缘屏障(如高大山脉、沙漠等)、交通运输通达度很高、战略要地充足时,这种战略收益或损耗都会成几何倍数增长。随着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先后崛起,导致地中海地区的拜占庭、威尼斯和后来的奥斯曼帝国要关注与这些新兴大国的战略通道价值,尤其是大西洋和环非洲贸易航线路的开通削弱了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的战略杠杆作用,使奥斯曼帝国无法分享地理大发现带来的红利,新兴的战略通道促使奥斯曼帝国将战略利益延伸至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加速了奥斯曼制海能力的发展。^①历史上,俄国长期缺乏温暖港湾,海岸利用率低、出海通道受阻、海岸分散不易协调,

影响了俄罗斯的战略转型和总体力量的发挥。^②

(3) 攻防平衡

尽管攻防平衡的相关理论解释涵盖众多,但这里仅把海权与陆权技术层面的攻防平衡关系作为分析重点。特定的权力对比类型相比较现实主义通常强调的总体能力的分配,更有助于完善对国家所面临的外部战略环境性质(约束性/包容性)的评估。但当下文提到的战略学说所反映的攻防平衡认知与现实攻防平衡技术条件差异过大时,则该结构性调节因素就不如次单元层面的战略学说对转型的作用程度大。

军事技术领域的攻防平衡,作为特定和精细的权力结构,能对处于战略转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提供脆弱性或机遇“窗口”。军事技术作为结构性调节因素,能够很好地补充总体权力结构所不能解释的战略转型的某些内容,毕竟战略转型的核心还是军事安全领域的转型。有些学者认为军事技术的攻防平衡变化,能够潜在地影响体系中的所有大国,落实到特定国家的战略转型,有一些攻防平衡态势确实会作用于整个体系结构,进而对单元的预期行为有均衡的影响。但有些攻防平衡因素的影响力仅限于体系内的特定区域,只有在特定的两个国家或两组国家(如美苏或北约与华约)之间,或在特定地理区域内,军事技术上的攻防平衡才会对国家间战略关系的安全困境或其螺旋升级产生充分的效应。一战前,德国与英国开展无畏级战列舰的海军军备竞赛,就是为了借助其崛起的陆上实力,并将之迅速转化为海权技术超越英国的机遇窗口,改变不利于德国的海上攻防平衡态势。实际上,当时德国海军已经仅次于英国位居世界第二,但只有把军事技术的攻防平衡关系放到英德两国,才更具参考价值。此外,也正是当时海权领域已经呈现出攻方占优的趋势,才迫使德国加紧建造无畏舰。

^① Palmira Brummett, “The Overrated Adversary: Rhodes and Ottoman Naval Power”,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36, No.3, 1993, p.540.

^② 陆俊元:“海权论与俄罗斯海权地理不利性评析”,《世界地理研究》,1998年第1期,第40-44页。

宏观地讲,陆权比海权领域的军事技术更具天然的威胁性,即便是近代海权大发展时代,很多国家依然认为,对本国战略安全的最大威胁是来自能穿过领土边界的陆上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控制和占领领土、掠夺或摧毁资源、废黜政治领导人、强加新的政治结构和社会体制。陆权强国致力于陆权的稳固和扩张,其它大国通常会结成防御性联盟。而单纯的海洋强国只有较小规模的陆军,很少会具备陆权扩张的能力和动机。^①

3.2 单元和次单元层面

体系结构本身不会直接作用于战略转型。尤其是当外部战略环境不那么具有约束性时,则单元和次单元层面的因素会对结构影响发挥更大的中介过滤作用。反之,如果国家处于相对约束性的战略环境中,体系提供的机遇和威胁信息明确,国家的政策选择空间很小时,国家和国内层面所发挥的过滤作用就会降低。即外部战略环境与国家层面对战略转型所起的作用成反比。

按照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认知、决策和政策执行这三种国内政治进程会在不同程度上扭曲体系结构对国家战略转型结果的影响。战略学说作为次单元层面的变量,会对认知进程产生作用,塑造国家对体系威胁和机遇信息的解读;国家大战略所设定的崛起路径则对决策进程提供限制和方向;国内汲取资源和动员能力则影响政策执行的物质能力分配;国内经济转型则从总体上对认知、决策和政策执行产生持续作用。

(1) 崛起路径

崛起路径在宏观上为战略转型规范了大致的方向和程度,崛起路径与战略转型是一种共生关系。陆海复合型国家崛起路径的选择可分为孤立式崛起、进取式崛起、挑战式崛起和融入式崛起。

① 孤立式崛起

主要适用于在地缘格局上处于体系侧翼的大国,远离地缘政治对抗中心,可以开展较为独立的崛起和战略转型进程,较少受到其它海陆强国的制衡,具备从陆权强国直接发展为海上主导国的跨越式条件。孤立式崛起的典型是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门罗主义和

门户开放的方针指引下,凭借远离欧亚大陆事务中心的地利条件,以及成功的外交策略,得以全面推进海权转型。

② 进取式崛起

处于地缘格局对抗的核心地带,难以实现融入式或孤立式崛起,而又不想陷入与其它大国的全面对抗。只能通过合纵连横、轴辐式联盟策略来努力营造一种有利于自身崛起的战略环境,进取式崛起具有防御性倾向,尽量不诉诸战争改变地缘格局现状。国家并不试图采取陆海并重或海主陆从的转型模式,而是维持陆主海从的防御性战略取向,最大可能的通过非战争手段实现体系内“非正式霸主”的战略地位。进取式崛起的典型案例是俾斯麦治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德国地处欧洲心脏地带,一旦崛起将改变整个欧洲的地缘格局,为了避免在大陆和海洋出现强大的反德同盟,俾斯麦德国在从陆权向海权转型的进程中非常注意避免与海上霸权国的冲突,并在海上和陆上都秉持防御性战略,不断推进德国的经济性崛起,构建了大陆联盟体系,实现了制度性崛起,德国稳固的成长为欧陆第一军事强国则标志着军事性崛起的推进。

③ 挑战式崛起

与进取式崛起一样,选择挑战式崛起路径的国家通常处于体系对抗的中心地带,但选择挑战式崛起的国家会带有进攻性战略取向,甚至不惜以大规模战争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历史中不乏成功的案例,如古罗马在建立大陆霸权后,击败迦太基,称霸地中海。但是随着国际体系和攻防平衡相关技术的演化发展,其挑战成本越来越高。威廉二世德国是挑战式崛起的代表,为了同时成为陆上和海上的双料霸权国,不惜与当时体系中主要的海陆强国发生全面对抗,招致反德大同盟的组建,其陆海并重的战略转型尽管不能直接成为一战失败的根源,但它分散了德国的战略资源,使陆权力量发展受限。戈尔什科夫时期的

^① Jack S. Levy and William R. Thompson, "Balancing on Land and at Sea: Do States Ally against the Leading Global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5, No.1, 2010, p.16.

苏联逐渐从大陆转向海洋,尽管仍然维持陆主海从的战略传统,但其海权更多是作为维护陆上霸权的手段,不断扩展海外势力范围,寻求美苏在海上和陆上的全面对抗,最终由于国内汲取资源和动员能力的过度自耗,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进行战略收缩,战略转型戛然而止。

④融入式崛起

有助于大陆强国在向海洋转型进程中避免与海上霸权国的直接冲突与对抗,并不试图发展出与海上霸权国对等的海上力量,而是坚持陆主海从和防御性战略取向。通过加入到现存的大陆和海洋秩序中,不去激烈改变地缘格局现状,而是融入到既有霸权国的地缘秩序下,尽可能降低自己的战略转型成本。21世纪的中国是最为典型的案例,由于中国并不想直接挑战霸权国主导的权力格局和秩序规则,但也不意味着全然接受既有的地缘格局和秩序中不合理部分,而是通过渐进的防御性战略转型,在不挑战美国海上霸权的情形下,逐步通过战略转型来实现崛起资源的优化配置,依托持续的崛起来反哺战略转型所需资源和能力,用相对和平的手段对现有国际秩序进行合理的修正和完善。

(2) 战略学说

战略学说是决策者、智囊集团、国内其它利益团体、著名学者和战略家等对战略转型认知的主流性汇集,是在该国起主导作用战略学说、信仰和信念。按照地理属性可以分为陆权学说/海权学说;按攻防偏好可分为进攻性与防御性学说。

①陆权学说/海权学说

从地理属性来看,大国有着基本的战略学说选取偏好:位于中心位置的欧亚陆权国家向外扩展,位于外缘的海洋国家则向内包围、挤压。这种模式至少自拿破仑时代起就已存在,已成为大国战略转型决策的一种默认背景。对于陆权主导国而言,其战略学说的意象很难把遭受入侵和包围的场景放在一旁,也不会轻易放弃寻求地缘政治缓冲区和重商主义的经济堡垒。任何采用大陆模式学说的国家都面临着扩张限度与何时止步的固有难题。在古代,对本土安全的需求演

变为建立帝国,如果一个陆权国成功地在其周围建立起缓冲区,那么它该如何去保护这些缓冲区呢?以古罗马为例,缓冲区之外还需要缓冲区,最终就是统治全世界。拿破仑与希特勒也一样无法容忍一个强大的苏联(俄国)潜伏在东方,最后都走向了侵略。对于海权主导国来说,其战略学说也会估算陆权国实力不断增长所带来的威胁,试图对陆上强国采取制衡战略。在不受到明显海上威胁情况下,大陆强国即使有漫长的海岸线、优良的港口、便利的出海通道、强大的舰队,也可能采取大陆式的战略学说。陆权国也关注通向海洋的权利,但更多的则是试图建立各种支点来保障其通向海洋的通道,防止对手进犯,本质还是海洋服务于大陆战略目标。总之,大陆模式与海洋模式的战略学说具有天生的排他性,都是为了限制和削弱竞争对手,一方的获益往往以另一方受损为代价。

②进攻性学说/防御性学说

从进攻和防御的信条来看,相信攻方占优的历史案例有很多。“国际结构经常是良性的,但关于权力结构的认知往往是恶性的”。^① 一个大国拥有军事上的优势并且预见其相对军事力量开始达到顶峰,就容易采取更大的风险行动。^② “进攻占据优势地位在历史中是相当少见的……认为进攻占据优势地位的观念却是相当普遍的”。^③ 陆上强国更能认可陆权占优且防御有利的博弈局面,而不那么愿意接受海权占优且防御有利的现实。奥斯曼帝国的地理位置限制了扩张,它漫长的陆地边境,以及匈牙利、波兰、俄罗斯、萨菲等国对它的边境压力,都需要持续的战略资源投入。在西、荷、英等国海权崛起的背景下,本应采取防御性战略取向,但却在地中海、印度洋、中东和欧洲地区同时追求进攻性政策,1683年进攻维也纳的失败标志帝国的彻底衰落。

^① 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6.

^② Dale C.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27.

^③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著,何曜译:《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的根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4-145页。

领导人会关注与其它海陆强国的动态攻防平衡对比,并在某些问题领域采取进攻性政策。尤其是当这种对己方进攻占优的憧憬或防御弱点的担忧升级时,就会形成大战略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机会窗口”与“脆弱性窗口”。前者是一种正在减弱的进攻性机会,而后者是一种正在成长的防御性弱点。^① 自从19世纪90年代以来,相信进攻占优的思想急剧增加,并在临近1914年时上升到非常高的程度,然而,客观现实是防御优势在1914年达到高峰,进攻性的征服行动仅仅在核时代比此时更为困难。德国的军方采用了进攻性的军事学说,文官精英也认为进攻在战时占有优势,而且未来的战争将是短暂而有决定性的。对进攻或防御的偏好,使国家的战略转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影响。德国的施里芬计划和提尔皮茨的“风险舰队”论,都是建立在进攻性力量更具优势的假设下提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出于对进攻优势幻想而发动的,然后又被实际的防御优势现实所拖延”。^②

防御占优的战略学说有助于国家相对和平的战略转型进程。俾斯麦时期的德国,以老毛奇为代表的军事战略家信奉陆权占优且两线防御作战更为有利,德国在这期间实行陆主海从的防御性战略转型,在扩大包括殖民地、市场、贸易、海上交通线等海外利益的同时,没有削弱自身的陆权优势,也没有加剧其它大国对德国的制衡倾向。古巴导弹危机后,核恐怖平衡强化了大国的防御性倾向,苏联开始注重发展大型水面舰艇等常规军事力量,逐渐弱化了美国本土进行大规模核打击的战略意图。1996年台海危机后,出于维护主权等防御性战略目标,中国逐渐向海权转型。但如果采取的是消极防御学说,则不利于本国的战略安全利益。洋务运动后的清政府信奉海守陆攻的作战原则,更倾向陆权占优情势,强调海军的防御性功能,实行近岸防御,以海防应对海权,这种消极防御战略学说,使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完全塌缩。^③

(3) 国内资源汲取和动员能力

如果国家决策者与国内关键利益团体、普通大众的关系良好,则有助于国家按照结构现

实主义逻辑进行转型的资源分配与国内动员。然而历史和现实中的国家战略转型,作为一种大战略调整,本身就意味着要改变过去的惯性战略模式,很难在较少国内制约的情况下推进,国家-社会和谐程度很难达到理想状态。因此,战略决策可能为了迎合一部分国内政治联盟的利益诉求而牺牲一些对外安全战略上的利益。即战略转型的资源汲取和战略动员,通常意味着是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的效果”。

清朝的陆上实力羸弱,在海上和陆上都缺乏稳定的同盟体系,后期的两次海防大筹议,限于海陆双重羸弱的局面,且没有建设现代化的财政体系和官僚体制,作为农业帝国的资源汲取能力严重不足,海防、陆防并举的双重心格局很难落实,缺少稳定的陆上安全环境和强大的国力来保障持续有效的战略转型。^④ 日俄战争后沙俄强化海权尝试的失败,以及苏联建国初期海权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也都与国内资源汲取和动员能力羸弱有关。路易十四法国尽管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实现了欧陆半霸主地位,但受制于海上战争和大陆扩张的有限导致的战略资源内耗,最终归于失败。对法兰西第二帝国崛起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不是它极力扩张的殖民地和海外势力范围,更多的是工业化和铁路等国内陆权建设。^⑤

资源汲取和动员能力往往集中体现在军力构成、技术研发、军费开支、军事规模等要素,它能折射出国家如何利用崛起的地缘权力的意图。在军力构成和技术研发上,不挑战霸权国军事领域中最具优势层面的实力或技术,是向霸权国释放善意信号的重要因素。特定的海上力量构成则能够比较明确地反映出一国总体的战略取向,主导性海洋强国也可以根据一国海

①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著,何曜译:《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的根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9页。

② [美]乔治·H.奎斯特著,孙建中译:《国际体系中的进攻与防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③ 鞠海龙:“晚清海防与近代日本海权之战略比较”,《中州学刊》,2008年第1期,第206-210页。

④ 左立平著:《中国海军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27页。

⑤ 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7-360页。

上力量构成来判断对自己的威胁程度。^① 但即使国家的军力构成和技术研发不持明显的挑战霸权动机,如果军费开支和军事规模呈过快速度增长,那么也可能引发其它海陆强国的权力制衡。对海上力量持不同观点的统治者继位会影响到决策层对军事战略和力量的偏好程度,进而决定是优先经济建设还是军事、优先发展陆军还是海军、优先发展战列舰、航母还是小型舰艇。“一个国家的战略处境归根结底取决于自身的战略实力与其他方战略实力之间的对比关系”。^② 即使面对同样的威胁,国家动员国内资源进行防御的能力也存在差异。^③

(4) 国内经济转型

正如世界经济变迁在大国地理互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样,国内经济转型也对国家战略向海洋推进起到关键角色。国内经济转型会受到全球化等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也只有国内经济的外向型取向抬升,才能为国家向海洋转型提供经济利益动机,并为国家汲取和动员必要的转型资源提供基础。国内经济转型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影响战略转型,一是国家通过向海洋转型来倒逼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二是转型中的国内经济对海外市场、资源、能源、投资地、港口、关键水道等方面的利益诉求,驱使国家推动战略转型。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秩序、走向海洋,就与国内经济规模的不断壮大有关,经济体量的增大需要更多的海外经济区来解决国内经济崛起的产能富余,而不断实现对外开放、推广外向型经济发展、融入和修正既有的海洋经济规则,则有助于促进国内经济向更具海洋性和开放性的方向转型。

四、结 论

中国与历史上一些转型大国具有一些相似之处,如有着悠久的大陆主义传统、容易受到海陆强国的双重制衡、都需要处理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结构性矛盾、都面临海陆资源分配分散化的潜在问题以及都处于民族主义勃兴的国家背景下。但中国更具有崛起与转型的特殊背

景:首先,中国执行了较长时段的“韬光养晦”政策,关注统一和发展成果,倾向地缘战略的防御性和守成性,把海权和陆权力量看作手段而不是终极目标。其次,中国推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融入式崛起路径。此外,中国由陆向海的转型动机是为了实现经济性、制度性、军事性和道义性的全面崛起,而非历史上诸多大国更在意的军事性崛起,中国的地缘战略转型是防御性目的,不想取代美国的霸主地位。与其它大国的海陆结盟战略不同,中国采取非结盟战略,且中国认为二次核打击能力有助于防御占优,中美大战可以避免,更重要的是,中国对崛起可能引发的大国制衡有清醒认知。

国内学界和战略界的主流认知是中国从大陆向海洋转型具有时代性、必要性和可行性,中国应在战略转型中坚持陆海统筹。^④ 中国应通过“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亲、诚、惠、荣”的周边外交、总体国家安全观、和谐世界、合作共赢等战略理念,努力为中国的崛起和转型营造相对包容性战略环境,降低海陆强国的制衡压力,减少威胁来源,扩大体系提供的机遇窗口,在核威慑和常规威慑领域保持大国的战略平衡,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和政策实现与其它国家在地理空间的良性互动,使体系结构对国家决策和国内政治经济进程产生较为积极的作用。在国家与国内层面,中国应秉持防御性和

① 吴征宇:“论陆海复合型国家的战略地位——理论机理与政策选择”,《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5期,第70页。

② 周丕启著:《大战略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165页。

③ 陈志瑞、刘丰主编:《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页。

④ 具体可参见:倪乐雄:“从陆权到海权的历史必然——兼与叶自成教授商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1期,第23、24页;张文木:“制海权与大国兴衰的启示”,《学习月刊》,2005年第3期,第21页;张文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第86页;吴征宇:“海权的影响及其限度——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海权思想”,《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2期,第106页;徐弃郁:“海权的误区与反思”,《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5期,第16页;竭仁贵:“对海洋霸权与大陆均势关系的再探讨”,《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1期,第71页;刘江永:“海陆和合论:‘一带一路’可持续安全的地缘政治学”,《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5期,第3页。

陆主海从式的战略学说,坚持融入式崛起路径,不称霸、不扩张,在国内资源的汲取和动员上实现经济与国防、国内与国外的统筹协调,避免陷入大国的过度扩张式资源汲取。中国应力求营造有利的外部战略环境,使之对国家和国内决策、政治经济发展产生良性作用,最终形成符合中国和平崛起、合作共赢等理念的战略转型。

中国的“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都很重要。如果国家实力和全球影响力大增后,执行“韬光养晦”而忽视“有所作为”,那么既不能缓解崛起压力,也不能有效实现本国利益。如果因为国家崛起后,就完全放弃“韬光养晦”,试图在各个领域都寻求广泛的“有所作为”,也可能导致崛而不

起或难以实现转型。因此,中国应该实现“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有机结合,既要实现陆上安全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也要为本国的持续崛起提供足够的海外经济区;既要突破陆海复合型国家的战略困局(如海陆资源分配分散化和海陆威胁的双重挤压等),也要尽可能化解与其它强国的地缘冲突;既要避免受到其他国家冲突的牵连,也要阻止或化解其他强国对中国的联盟制衡。中国的战略转型与和平崛起是一脉相承和互相促进的,需要保持足够的战略远见。

编辑 邓文科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Maritime-Land Countries'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and Its Enlightenment for China

QIN Lizhi¹

(1.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0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geopolitics to analyze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maritime-land countries' transformation from continental powers to maritime powers. The dynamic mechanism consists of the structure, unit and subunit elements. The structure involves geo-pattern, geographic interaction and the balance between offense and defense, and the three parts altogether shape the inclusive or restrictive strategic environment of the countries. The unit and subunit elements cover strategic doctrine, paths of rising, capacity to absorb domestic resources and mobilize, and domestic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which respectively influence the perception, decision-making, and enforcement of the national strategic decision.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external strategic circumstances function in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nly after being filtered by the mediating variable of national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level, and the efficacy of independent variable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at of mediating variable. China's transformation to a maritime power is confronted with challenges unique to the times such as historical background, strategic environment, the path of rising, strategic doctrine, and the ability to absorb resources as well as mobilize. The optimal path of China's transformation is to take the defensive mode in which the continental power dominates while complemented by the maritime power. Such a path could make a balance between "keeping a low profile" and "being proactive in actions", and avoid the tragedy of over-expansion in the rise and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great power.

Key words: maritime-land countries; neoclassical realism;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continental power; maritime power